

徐松石牧師--滬西扶輪社的最後書記

Reverend Princeton S. Hsu - The last Rotary Club Secretary of Shanghai West

劉敬恒（中華扶輪史研究員）2014年10月10日



Reverend Princeton S. Hsu, MA, (徐松石牧師) was the Secretary of the Shanghai West Rotary Club (滬西扶輪社) for 1950-1951. Unfortunately, the Shanghai West Rotary Club was short-lived. It was organized in 1948, admitted to Rotary International on November 16th, but its membership was terminated on 24 January 1952. Hsu was one of the last 22 active members before the Club's dissolutio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most proximate reason for Rotary International's termination of membership was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June 1950 – July 1953). This War made the United States an ad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華人民共和國), and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environment was certainly unfavorable for Chinese Rotary Clubs to be members of Rotary International which is located in Chicago, U.S.A.

Reverend Princeton S. Hsu (1900 – 1999) was a prominent 20th-century Chinese Baptist pastor, educator, and historian. Born in Canton (*Guangzhou*) (廣州) on 13 November 1900, with ancestral roots in Kwangsi (*Guangxi*) (廣西). He received his education in Rong Xian, Kwangsi (廣西省容縣), the British Crown Colony Hong Kong (香港), Shanghai (上海), and U.S.A.

- Pastoral Leadership: Hsu served as the Senior Pastor of Tsim Sha Tsui Baptist Church (尖沙咀浸信會主任牧師) in Hong Kong from 1960 to 1975. He was also a director for the Chinese Baptist Press (浸信會出版社).
- Educational Impact: For 25 years (1927–1952), Hsu was the Principal of Chongde School for Girls (崇德女子中學) in Shanghai.

- **Research & Publications:** Hsu was a prolific author and historian, specializing in Chinese culture,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One of his notable scholarly interests included the Chinese discovery of America.

His personal papers, which document his extensive work in publications, translation, and education, are preserved in the “Princeton Hsu Papers” collection at th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 He is remembered as a bridge between faith and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徐松石牧師(Reverend Princeton S. Hsu)是滬西扶輪社(Shanghai West Rotary Club)1950-1951 年度書記。可惜滬西扶輪社的生命很短暫，它在 1948 年組織，11 月 16 日加盟國際扶輪，然而在 1952 年 1 月 24 日被終止會籍。徐松石是該社解散前的最後 22 名現職社員之一。人們認為，促使國際扶輪終止會員資格的最近似原因，是朝鮮戰爭爆發（1950 年 6 月-1953 年 7 月）。這場戰爭使美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敵對，政治和社會環境肯定不利於中國的扶輪社加入位於美國芝加哥的國際扶輪。

徐松石是基督教上海浸信會牧師、歷史學家、民族學專家，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University of Shanghai)，並於十九歲時歸信基督教。抗日戰爭期間，徐松石於國內組成第一個基督教文社，向國民宣揚基督教。徐松石亦是一名民族歷史學者，並以中英兩種語言，編纂多部民族研究的書籍。並且引經據典，提出有關華人開闢美洲大陸、華人為印第安人、愛斯基摩人先祖的證據。代表作品：《粵江流域人民史》。

徐松石自稱「屬客家族。遠代祖先，世居廣東省蕉嶺縣」；「明末清初，先人的一位，遷居於廣東省肇慶府新興縣」。大清國康熙十二年(1673 年)，新興徐氏族人的支，落籍於廣西省容縣，為容縣徐氏始祖。傳至徐松石為第 10 世。



出身及少年時期 (1900-1915)

徐松石，初名「振奮」，及長，自改「振凡」，字松石，又字仲石，信仰基督教後常以 Princeton S. Hsu, M.A. 或 Rev. Princeton S. Hsu, M.A. 刊發文章。祖籍廣西容縣，1900 年 11 月 13 日出生於大清國廣東省廣州。徐松石的父親徐玉其是清代秀才，曾留學日本；壯年時辦學、著書、經商，倡導實業救國。母親甘淑慈，祖籍廣西容縣。徐松石幼年及少年時期，先後在家鄉容縣和英國殖民地香港讀書。他自幼受父親嚴格教導，學習中文；年少時便已接觸中華傳統文化的經典古籍，「幼讀儒書，稍長兼愛釋老之學」。在信仰方面，由於其家人只有拜祖先的習慣，別無其它信仰，且有「重視國粹，輕視外來風化」的傾向，故此一家人與基督教絕緣，他也不例外。直到入讀上海滬江大學之後，徐松石才接觸到基督教。

上海時期 (1915-1957)

滬江大學期間 (1915-1922)

1915年，徐松石15歲時，隻身從香港赴上海求學，次年考入滬江大學預科，並於1918年升入滬江大學本科，就讀於社會教育系。滬江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1906年由美南浸信會華中差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和美北浸信會華東差會(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共同創辦，最初名為「上海浸會大學」(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設大學、神學院兩部，1914年更名為「滬江大學」。

在滬江大學求學期間，徐松石與基督信仰有了接觸。1918年秋升入本科後，他對於基督教的福音，漸漸發生興趣。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來華宣教士大量增加，徐松石便有了更多聽道的機會。在一次艾迪博士(Dr. George Sherwood Eddy)的佈道會中，徐松石深受感動，決心歸信基督，時年19歲。不久後，於1919年4月12日，徐松石接受浸禮入教。他在攻讀社會教育專業的同時，亦兼修滬江大學神學院的神學課程，生活忙碌卻愉快得很。

1919年，五四運動席捲全國。徐松石受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時常應用西學析解中國的社會現象，寫成多篇文章發表在基督教雜誌上。才華初綻，被譽為「滬江三才子」之一。除寫作文章外，他亦從事翻譯及著述。1920年，徐松石翻譯了《兒童德育訓練法》一書；1921年他參考、吸收西方近代教育原理，寫成首部學術專著《新教育理論》，由上海廣協書局出版發行，流通頗廣。1921-1922年間，徐松石被大學推舉為上海學生會書記和校刊《天籟》的中文總編。

出版社期間 (1922-1927)

1922年，徐松石從滬江大學畢業。畢業前一年，他已被當時的滬江校長魏馥蘭博士(Dr. Francis John White)推薦給威林士牧師(Dr. J. T. Williams)，後者正計劃在滬設立美華浸信會印書局(China Baptist Publication Society)(即後來的浸信會出版社 Chinese Baptist Press)上海編輯部。於是，1922年7月徐松石畢業後，便受聘為該書局上海編輯部主任，負責編寫浸信會少年團季本及主日學師範課程。又在《真光雜誌》發表文章，是當年反非基同盟的青年勇將。1924年，徐松石出版了《家庭教育與兒童》一書，探討幼兒教育理論。該書於1931年和1936年兩度再版，在學界影響頗巨。其後，他又翻譯了《實用兒童教育學》，作為主日學合會師範課本。同時，他還編譯了許多聖詩，在教會中流傳甚廣。這一時期，徐松石的學術研究方向主要在基礎教育。

在服務美華浸信會印書局的五年中，徐松石經歷了人生中頗為重要的幾件事。其一，1923年，他參與了全國第一個基督教文社的組建會議；其二，1924年，由港粵名牧劉粵聲牧師證婚，徐松石與郭琪芬女士結為夫婦；其三，受「非基督教運動」和「北伐運動」的影響，許多西方宣教士退居二線，讓出行政大權，只擔任顧問或輔導角色。如此便需要華人起來，擔當領導及行政職務。徐松石於1926年被按立為上海廣東浸信會執事，其後經常在此教會及其它教會講道，並兼任主日學及少年團契指導員的職務。

女子中學校長期間（1927-1952）

1927 年秋，徐松石辭去出版社職務，在短暫代理某公立中學校長之後，出任滬江大學所屬的上海崇德女子中學校長一職。為方便師範科教學，於 1928 年 11 月出版《演講學大要》，是徐松石的第二本著作。徐松石其後前赴美國田納西州立大學(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進修，獲歷史學碩士。他在中學校長職位上工作 25 年之久，在此期間，徐松石的社會職務頗多。除了擔任崇德女子中學校長一職外，還兼任滬江大學、之江大學(Hangchow University)、華東大學教授職務；同時亦擔任上海基督教中學聯誼會主席、華東基督教教育會會長；並在張亦鏡先生去世後，一度兼任上海浸信會《真光》雜誌總編輯等職。

與此同時，徐松石在學術上也頗有建樹。大約在 20 年代中期，他的學術方向有了一次轉變——從基礎教育轉入對民族歷史的研究，從而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術地位。他累計著有多部研究民族歷史的學術著作，成為中國著名的民族學家、歷史學家、研究嶺南民族歷史文化的著名先驅。他從 1926 年起，即對東南亞民族史開始研究。特別在抗日戰爭一段日子，他專程到廣東肇慶、德慶、羅定；廣西梧州、平樂、桂林、容縣，以及湖南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實地考察和調查。1938 年，他寫成了第一本學術著作《粵江流域人民史》，由中華書局出版，立即被日本的學者譯成日文在日本發行；此書當時在國內也是一本見解獨特的搶手的學術著作。1947 年，他的另一本著作《泰族僮（壯）族粵族考》出版，獲得了當時全國級的學術著作獎。

在這一時期內，徐松石亦忠心服事教會。1929 年 6 月，他應邀列席參加有關建立本色化教會的討論。此討論是由中華基督教協進會主席誠靜怡牧師倡導的，以推動中國教會自立、自養、自傳。一方面鼓勵中國教會要多負責任，一方面要使基督教配合中國的文化背景。

1935 年，徐松石參與美南浸信會差會將教會產業移交華人自理的過程。抗日戰爭時期，徐松石被按立為上海浸信會牧師聖職。同時，他與另一教會大學——聖約翰大學(St. John's University)的校長一起，帶著耶穌基督的愛與憐憫，積極開展教會學校對抗戰時期難民的救助事工。雖然自身也處於戰爭的危險處境中，但仍不忘伸手救濟難民。

徐松石除牧養教會、開展慈善救助外，也滿懷佈道熱忱。在 1935-1940 年間，他利用暑假，前往西南邊疆少數民族地區佈道，將福音帶到少數民族同胞中間。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徐松石於 1947 年飛往臺灣，作短期的宣教之旅。在臺北為 8 位決志信奉基督教的弟兄姐妹，施行了浸禮。

1948 年，徐松石又完成《中華民族眼中的耶穌》一書的寫作。該書是比較宗教學之力著，幫助讀者了解基督教的教訓與中國宗教及哲學思想的關連。並可在基督教的教訓中，引用中國宗教的術語。

1949 年之後，時局變動，教會處境日趨艱難。1952 年，徐松石卸任崇德中學校長一職。此後一連 5 年，因為社會環境已不允許，徐松石只能「杜門修養，除自由傳道外，暇日輒潛心於著述工作。」

香港時期 (1957-1975)

1957年3月，徐松石獲准赴香港定居，便潸然淚別上海南下。兩個月後，其妻也獲准離滬赴港。

在香港十八載，徐松石繼續在教會、出版和民族學研究等方面大步發展。教會方面，他於1960年任職尖沙咀浸信會主任牧師，直至1975年離港，影響很大。除了本教會的侍奉外，他還擔任亞洲浸信會神學研究院(The Asia Baptist Graduate Theological Seminary)董事，常常應邀赴東南亞各地教會培靈講道。此外，他還兼任香港浸信會出版社編輯、總幹事；亞洲浸信會出版社社長，以及香港浸信會聯會董事、副主席、書報部部長、主日學夏令營和各種研討會講員、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部顧問等職務，確是一位富具才華的牧師。當他繁忙工作的時候，仍然不斷努力寫作，撰著《田間舉目》、《田間默想》等書培育信徒靈性。徐松石在每篇講章之後，多必寫有律詩，使讀者留下豐富的回味和思考。他的講章亦往往成為學習講道者的參考，帶來許多的啟發。就是依書直講，亦不會犯錯，對神學生和傳道人可謂幫助甚大。

在香港期間，徐松石的著作頗豐，僅由浸信會出版社出版的就有五十餘部。其中代表性作品有《基督教與中國文化》、《日本民族的淵源》、《東南亞民族中國血緣》、《百粵雄風，嶺南銅鼓》和《華人發現美洲考》等著作。此外，他還撰寫了多篇學術論文，如《匈奴蒙古民族考》等公開發表。1963年，徐松石加入浸信會出版社出版的靈修季刊《天糧月刊》的編撰工作。1970-1975年，徐松石出任浸信會出版社社長；1975年從出版社退休後，尖沙咀浸信會仍請徐松石擔任長老職分。

美國時期 (1975-19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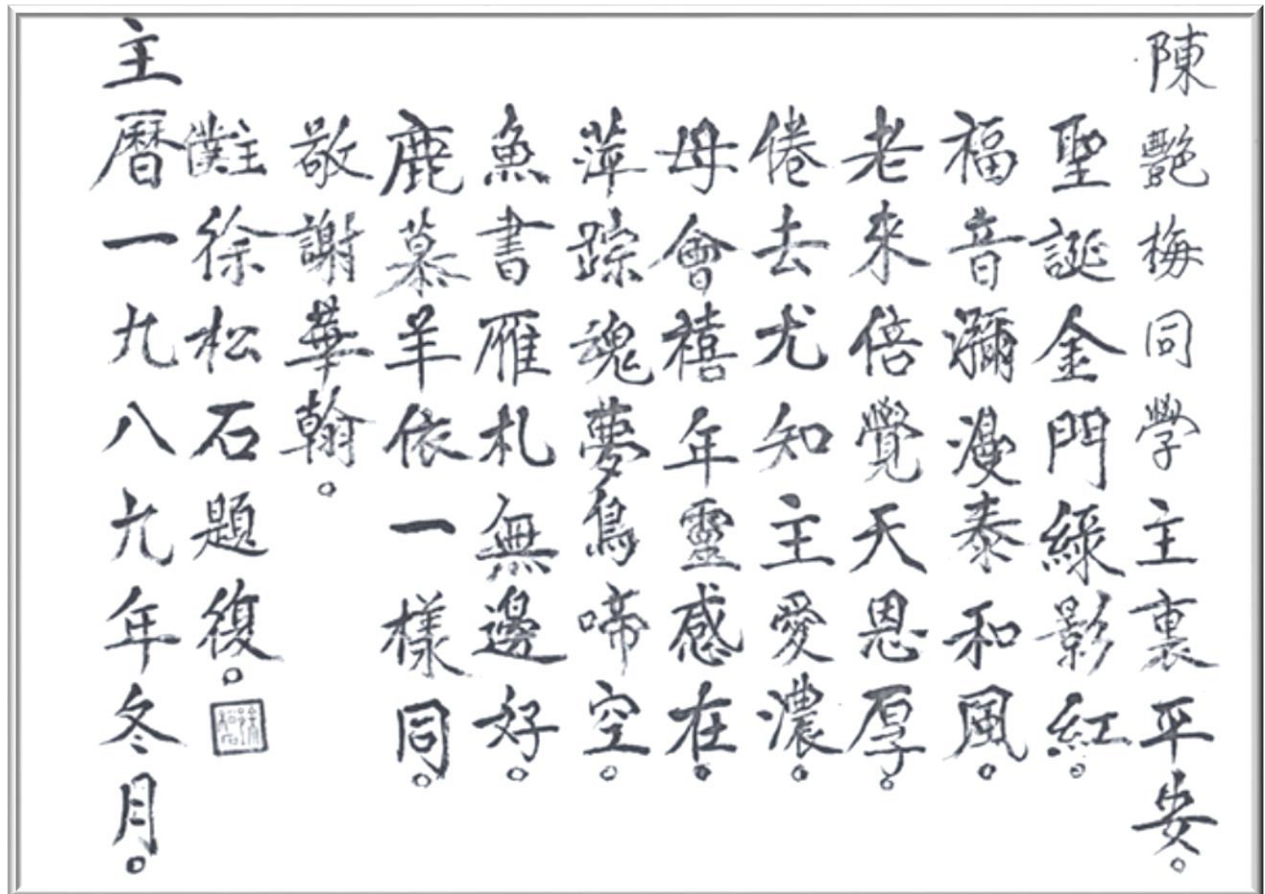
1975年，徐松石移居美國舊金山市(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U.S.A.)。到美國後，他應邀成為舊金山自立浸信會顧問牧師，繼續服事海外華人教會。至此，徐松石已經侍奉主半生之久。因著他豐富的靈命，常常被邀請到美國和加拿大一些城市教會為主證道。同時在多人鼓勵和支持下，他也繼續從事著文字事奉。

徐松石在美國，繼續深入研究東南亞民族史，用他自己的話說「已經作了多年廢寢忘食、嘔心瀝血的工夫」。以他研究歷史的喜好，他一生在史學上的成就，可謂著作宏豐，陸續出版了《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日本民族的淵源》、《百粵雄風嶺南銅鼓》、《日韓通古斯民族的淵源》諸書，為中國民族學，為史學界所稱譽。他用中文、英文同時寫作，好些著作具備兩種文字訂成一本。國際上有個跨國的研究所——遠東民族史研究所——出版一套東南亞研究系列叢書，其中有一批就是徐松石的歷史系列著作。

1983年，徐松石已80多歲，還出版了《華人發現美洲考》上、中、下冊。這套書（中英文共版）在全世界發行，用不可辯駁的史實、畫圖、照片；用中國嶺南銅鼓上的舞蹈花紋和北美洲印第安人土著的民族舞蹈完全相同；用北美洲印第安人的關於洪水的民間傳說和中國嶺南關於洪水的民間傳說完全相同；用北美洲的地名和族名和中國的地名相同；印第安人的撿祖先骨第二次安葬與中國南方的撿骨葬相同等等，證實了北美洲最早的移民是中國古老的人種。這個論點開始

得到歷史學界肯定。主事東南亞研究所的宋哲美教授收到華僑讀者來信說：閱讀《華人發現美洲考》如夢初醒，盛讚我祖先對歷史文化貢獻之偉大。

1999年6月14日，徐松石——這位世紀老人在美國服事華人教會近25年後，在神的恩典中逝世。如聖經所言，「為基督打完美好的仗，跑完當跑的道路，守住所信之道，安祥地回歸天家」。



1989年老校長徐松石給崇德女子中學前學生陳艷梅的聖誕賀詩。

徐松石神學思想的演變

徐松石的神學思想演變主要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接受儒釋道，到全面否定儒釋道，以及全面肯定西方文明和基督信仰。徐松石童、少年時期接受的是傳統的儒釋道三教思想；進入滬江大學之後，因接觸到西方文明，其思想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他一方面全盤否定儒釋道和一切宗教價值，另一方面全面肯定西方物質和科技文明，最終皈依基督教信仰。這種全面性的否定和肯定，與他自小培養的民族意識，以及對民

族命運的關注，有著密切關係。對他來說，哪一種思想能夠發揮「復興民族」的功能，便成為他看重的思想。「科技復興國運」是他救國的心願，也是他投考大學的目的。

第二階段，赴美國留學後，從絕對的否定和肯定，轉變為在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尋找對話的空間。1929-1930年間，徐松石赴美國田納西州的皮博迪學院修(Peabody College, Tennessee)讀教育學碩士課程。這次留學，可說開啟了他對「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這個議題的思考，在其著作《基督眼裏的中華民族》中他寫道：「迨後負笈西瀛，一方面感覺到列邦物質文明的流弊，一方面體察西洋民族真正立國精神所在，同時，反而證諸中國的固有文化，復從聖經教訓和本人經驗，加以審慎考察，於是思想又漸搖動。考慮愈深，越覺中國儒道的恢宏瑰麗，而且愈信孔道對於中國將來的出路很有關係；但無論如何，基督教總是最重要的。」所以，在30至40年代，徐松石致力於探討兩者之間的關係，試圖建議一個以神為基礎，輔以儒釋道的人生觀，來尋找「中國將來的出路」，以期待「復興民族」。這是他對本土文化和宗教最為開放的時期。

第三階段，到香港之後，從開放轉向基要主義。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以及環境的變遷，徐松石對自己所倡導的中國神學「本土化」萌發新的理念。開始力圖將一種跌入人本主義陷阱的中國神學「本土化」歷程，重新引入神本主義的軌道。因此，他認為自己「愚昧薄弱，過去的日子，虧欠主的地方很多。」他發覺：「今日的問題，絕對不是中國固有的文化，是否能夠容納基督教。更加不是基督教能否屈就，或配合中國固有的文明。問題的癥結或重心，在於今日傳揚中國的基督教，是否出於耶和華神，而與耶穌基督的啟示相合。」在此刻徐松石心中，主耶穌基督勝過一切的武備、物質進步、愛國心和新民族道德，而成為中國最大的需要。其神學思想由開放轉向了基要主義，一直到最後離世。

中日相和有新體驗

徐松石出生於1900年，其時適值清日甲午戰爭之後的第六年。正是八國聯軍入侵大清國，翌年簽訂辛丑條約，大清國割地賠款瀕臨瓜分局面。民窮財竭，社會環境至為艱苦。徐松石自幼親歷此種困境，及至一二八和八一三日軍在上海的暴行，和八年抗日戰爭，他說到「一家數口生活異常困頓」。徐松石是一位身受日本侵略禍害的人，在心理上的「仇日」潛意識是可想而知的。而當徐松石於1962年春間到日本佈道，在京都遊歷的時候，曾作詩云：「心懷纏纏到東瀛，如此風光別繫情，半世征塵虧欠甚，櫻花時節夜傳經。」

徐松石在抗戰期間，專治粵江流域民族、泰族、僮族，以及東南亞民族的淵源；戰後對日本民族亦作深入探究。一般日本史學家，只將神武天皇一年（公元前660年）作為日本創國可考歷史的開端。至於《日本書紀》和《日本古事紀》所載有關神話傳說，視之為繩文文化和彌生文化時期無科學根據的荒誕無稽故事，在科學論證上不加接納。可是徐松石從民族的源流去分析，發現日本是由多種民族所組成，如蝦夷族、北支古亞細亞族（即伏羲女媧族，通古斯宿沙族、南支古亞細亞族（浙閩的鳥田族）、中原漢族（徐族）、南支古亞細亞族（東甌和閩越族）、南方海洋部族、蒙古突厥族等等。其中神話傳說的故事，是與中華磐古、女媧伏羲、神農等的傳說甚是接近，所以徐松石於1966年撰寫《日本民族的淵源》，指出日本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古代流風遺跡，饒有興味。中日兩個連枝民族，在公元前三千年至公元前二百餘年已有密切關係，力指中

日民族本同源。徐松石在序文有詩云：「多少冤仇掩卻春，天涯原是舊芳鄰，也應一代新人出，靈風靈雨洗劫塵。」

徐松石誕辰 105 周年

2005 年 11 月 7 日上午，「徐松石誕辰 105 周年學術研討會」在廣西民族學院科技樓報告廳隆重開幕。廣西社會科學院、廣西民族學院、廣西壯學學會、廣西民族研究學會、廣西歷史學會的民族學和壯學領域的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開幕式上還舉行了《徐松石民族學文集》（上下卷）的首發儀式。據瞭解，《徐松石民族學文集》（上下卷）是《壯學叢書》編委會最近將徐松石 7 種學術著作和一批學術論文編輯而成，並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徐松石：壯學研究的先驅

何浩深 2009 年 8 月 21 日

在遊覽長江小三峽時，人們會看見西岸的懸崖上有許多懸棺，那是古代夔人（先秦時期在中國西南居住的一個古老民族）留下的，但夔人後來到哪裡去了？著名歷史學家、「壯學研究先驅」徐松石認為，這些夔人後來遷移到泰國北部清邁一帶。

徐松石（1900 年-1999 年）出生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容縣，曾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美國田納西大學，獲得歷史學碩士學位後定居美國。滬江大學是一所教會學校，所以徐松石是一個牧師。但他愛好研究歷史，上世紀 20 至 40 年代初，徐松石多次深入我國西南、華南民族地區考察。不但如此，他更跑遍了東南亞各國，是世界公認的研究東亞及東南亞歷史的權威。臺灣作家李敖在讀過徐松石的學術著作後曾說：「徐松石可以說是第一個用考古、史地、文化、民俗、人類學、語言學等方法來考察民族歷史，不讀徐松石的書，就不懂炎黃子孫的含義。」

在徐松石的著作中，曾記載和考證了許多獨特的鮮為人知的歷史，在這裡我們僅選取幾個有趣的成果作一介紹。

過去北方人稱南方人為「南蠻」，西南人為「西南蠻」，蠻者野蠻也。但徐松石考證出繁體的「蠻」原來只有上半部，不讀「man」音，而讀「氓、文、閩、蒙、孟」等音。《說文解字》一書中說「蠻」字上半部中間「從言」，表明南方民族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兩邊「從糸」，表明南方人發明了種桑養蠶紡絲技術。「蠻」字的上半部表明，這個南方人自我稱謂的字，包含著文明、偉大的含義。黃帝的妻子嫫母就屬「西南蠻」，傳說就是她發明了養蠶和繅絲。元代江浙地

區婦女黃道婆從海南島回來後，帶回了紉花、椎弓、彈棉、紡車、紡織技術。今天，繁體字「蠻」的上半部讀音「蒙」、「文」仍被粵語使用。粵語中仍稱小孩子為「細文仔」、「細蒙仔」，但意思絕不是指「小蠻子」。加上蟲字底，那是以後的事。但蟲字底也沒有貶義，如治水英雄大禹的禹，中間就有個蟲字。伏羲、女媧姓風，繁體的風字中間就有個蟲字。可見後人稱南方人為「南蠻」，實在冤枉！恰恰相反，以少數民族為主的華南、西南地區，均對中華文明作出過卓越貢獻！

中國的三大僑鄉是廣東、福建和廣西，徐松石考證出這裡的壯族比漢族更早成為「華僑」。北宋皇佑年間(1052年)，廣西廣源州(今廣西靖西、田東一帶)一帶的壯族首領儂智高起兵反宋，建立了大南國(今廣西南寧一帶)。中央政府派狄青、余靖鎮壓儂智高起義，儂智高帶餘部逃至雲南大理。後儂智高被當地人殺死，其餘部約10萬之眾沿著瀾滄江南移。這批浩浩蕩蕩的儂氏部下及壯人子孫，一部分行至普洱、思茅和西雙版納；一部分沿南烏江和湄公河進入泰國北境，建立蘭象和蘭那兩省。後與當地土人配合，勢力日大，再次進入湄公河上游。約在儂氏部下離開宋朝的200年後，在泰國建立了速古台王朝。泰國今天的主要民族小泰族，祖先就是當年的壯族。所以今天廣西的壯族人到泰國旅遊，不用翻譯就可以聽懂當地的泰語——小泰語。

兩廣的粵語中，融入了許多壯語語音、語法。粵語大部分語音來自中原的漢族古漢語音，但也有相當一部分吸收了壯族語音(特別是接近自然的語音)和語法。如粵語稱蝦(包括公母)為「蝦公」，而壯語就稱蝦為「公」。又如粵語學壯語叫隔夜菜飯的糟氣為「臭收」。粵語還吸收了壯語的倒裝語法，叫酸蘿蔔為蘿蔔酸，羹匙為匙羹，公雞為雞公，牯牛為牛牯，七妹為妹七等等。

如果說這些有趣的研究成果好像幾朵浪花，那麼徐松石豐厚的歷史著作則更像是浩瀚的大海。

1938年，徐松石的第一本歷史著作《粵江流域人民史》在上海出版，這本書後來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學術著作獎」。1952年至1956年，他在上海寫出了《東南亞民族的中國血緣》、《嶺南銅鼓的研究》、《日韓通古斯民族的淵源》等著作。1957年後，他移居香港，又出版了《日本民族的淵源》。此外，他還撰寫了許多學術論文，如《匈奴蒙古民族考》等十幾篇論文公開發表。

徐松石的父親徐玉其曾留學日本，參加過同盟會；其伯父徐玉鬻也在留日時參加了同盟會，還被孫中山任命為同盟會廣西分會副會長。兄弟倆一起到香港、新加坡宣傳革命。辛亥革命後，徐玉鬻與徐玉其解甲歸田，合辦鄉學。他們開辦的學校對窮人子弟不收學費，還贈書本文具；他們發動村民修水利，讓家鄉不再受旱。

徐松石的家庭背景，使他深受孫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影響，對少數民族十分敬重。在上世紀30年代的著作中，他就表明自己對帶有歧視含義的中國少數民族族名如「獠」、「獠」等稱呼十分反感，並率先將反犬旁改為人字旁。他的歷史著作從頭至尾，都在用歷史事實證明著南方少數民族的偉大、勤勞、善良、聰慧。徐松石認為南方少數民族對中華民族作出過卓越的貢獻，他還分析作為客家人的自己，身上也有壯族的血統，並引以為豪。

徐松石的治史方法，也影響了許多史學工作者。廣西民族研究所所長、研究員覃乃昌就曾說：「（徐松石）在長期的歷史研究中，運用地名學與語言學、歷史學與地理學的關係，分析華南及東南亞大量原生態地名和次生地名。從中概括出若干地名模式，構畫了歷史文獻失載的民族遷移歷史畫圖，揭示了這一地域各個時期的民族分佈和各民族關係，為民族學作出了貢獻。學習徐松石這種方法，華南不少歷史學者，在相關領域的研究中取得了優異的成績……」

